

丹

凤

共和国将帅 和他们的夫人



朝

主编 王太岳 周继强

光明日报出版社

阳

丹凤朝阳

共和国将帅和他们的夫人

第二卷

光明日报出版社

太湖之滨：最后相依相伴的日子

张闻天和刘英恢复组织生活以后，曾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信，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希望回北京度过晚年，一是希望中央给予到全国各地参观、学习的机会。信中说：“我想在我不能走动或变成瞎子之前，看看我所热爱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新面貌。至于旅途中的一切费用，都可用我们的存款来支付，不用另外花公家的钱。”然而，如此微薄的要求迟迟得不到答复。

1974年7月下旬，刘英因参加弟弟刘彬的追悼会从肇庆回到了北京。刘彬原来是冶金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造反派逼迫他揭发所谓张闻天“里通外国”的罪行，在江青等人的指使下，被北京钢铁学院的红卫兵刑讯逼供致残，不久迫害致死。这次，邓小平批示给刘彬开追悼会，给他平反。刘英利用这个机会到北京，住在冶金部的宿舍。追悼会后，她去看王震，对王震讲了张闻天的情况。说张闻天现在心脏病很厉害，没有办法医治，连氧气都没有，只能吃硝酸甘油。老的医生都搞掉了，年轻的没有办法。虽然他们和闻天的关系很好，但没有技术，没有抢救的条件，只能干着急。

王震说：“到北京来！去写封信给毛主席，要写上对过去的错误决不翻案，毛主席怕他翻案。”

刘英回去告诉张闻天，书生气十足的张闻天说：“那不行，怎么能这样写？”

刘英劝他：“你写了怕什么？回去治病不是很好吗？”

张闻天说：“怎么能不翻案？那个本来就是错的嘛。”

刘英说：“你真是个书呆子，做事情策略一点嘛。”

就这样，在王震的劝告下，张闻天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希望回北京生活和养病。这封信通过王震转给毛主席。毛阅后，让身边人员签批：“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地方居住。”张闻天想，北京不成，就回他阔别多年的家乡上海吧。但仍未获同意。5个多月以后，才接到通知：同意迁居无锡。

张闻天多想回北京居住啊！那里有他的老战友、老同事，北海公园、景山公园都留有他散步的足迹。那时，聂老总总是他最经常的散步伙伴。一次，

警卫员去请，见聂老总正在吃饭，回来告诉了张闻天。张闻天说：“走！咱们又不去抢他的饭碗，怕什么！”那是多么亲密无间的情谊啊！看来，想重温它的滋味，此生怕是很难了。不过，江南也是他的故乡，离开了56年，这次就算“千里来寻故地”吧！

1975年8月23日，张闻天一家离开肇庆，登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25日抵达无锡，被安排在太湖饭店的小山2号招待所，后来搬到城里汤巷45号。无锡的生活与过去相比，充满了宁静和温馨。

不久，维英和引娣姐妹双双赶来探望。维英看着父亲说：“爸，你显得老多了。”

“是啊，这是自然规律嘛！”张闻天问女儿：“这一阵子，你们是怎么生活过来的呢？”

维英的境况仍很不好，50多岁的人了，还到处找工作。按规定，这个年龄已不能做临时工，她只好瞒了岁数进上海羽毛厂干临时工。张闻天沉默半晌，心疼地说，“你年纪大了，万一受了伤怎么办……临时工就不要去做了。”



张闻天在风景胜地

两个女儿从小过惯了苦日子，特别能干，争着帮父亲做家务。她们每天起得很早，洗衣服、做饭、劈柴、擦窗、拖地、翻被子等样样都干。父女离多聚少，能在父亲老年时服侍尽孝，她们感到很满足。

张闻天担心累坏孩子。一天午饭后，维英正纳鞋底，他走过来说：“不要纳了，你劳动了一辈子，休息休息吧！子女们的穿着让他们去考虑。”他叹了口气说：“没有工作反而好，有了就要牵连到你了。”

76岁的张闻天身体十分虚弱，心绞痛多次发作，几经抢救，方才脱险。略微恢复之后，他想请医务工作人员吃饭，感谢他们对他的照顾。江苏省委常委韩培信对他说：“张老，这个客我们来请，绝不能要你的钱。”他吩咐大师傅到招待所拉菜，想吃什么就拉什么，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看着散发着甜香味的红烧肘子，张闻天馋得很，想吃

一点，刘英不同意：“你血压高，医生嘱咐不让吃的。”

韩培信夹了一块肘子放到张闻天碗里，对刘英说：“让他吃吧！不要限制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偶然吃一次没关系的。”他们知道张闻天的病已经不行了，愿意尽量满足他的要求。

而刘英呢，总觉得张闻天没大问题，还能好起来，她暗暗祈祷奇迹的发生。不过这是张闻天最后一次开荤了，以后他的胃已经容纳不了这些食物了……

1976年1月9日，撕心裂肺的哀乐送来了总理逝世的消息。张闻天心如刀绞，潸然泪下。此后，他多次从梦中惊醒，心脏深感不适。对死，他看得很坦然，在1月19日给外甥的信中说：“我年纪已75，突然事变的发生，也不是不可能。对人的生死，只有根据自然规律办事，过分操心或担心，也无用。”

4月，他连续几次发病，情况十分危急，他意识到将不久于人世，便把自己最大的心愿嘱咐给妻子：“我不行了……别的倒没什么，只是这十几年没能为党工作，深感遗憾。”他停了一下，郑重地说：“我死后替我把补发给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

刘英强忍泪水，默默地点点头。

见妻子不作声，张闻天便要她拿纸过来，写下保证，签上名字。这下，刘英的泪水夺眶而出：“难道你还信不过我？”张闻天安然地笑了。

关于这件事，张闻天和刘英的确写下了合约，“二人生前商定：二人的存款，死后交给党，作为二人最后所交党费。张、刘1976年4月”

1976年7月1日，党的生日这一天。张闻天这个有着51年党龄的老革命家，心情会是怎样的激动呢？几十年来，他伴着党走过了充满艰辛困苦的风雨历程，迎来了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辉煌。而一生对党和人民赤胆忠心的他，却在这偏远的地方蒙受着不白之冤。他的心里，会是怎样的波澜起伏啊！但是，伴随张闻天度过生命最后时刻的人，无论是刘英还是其他工作人员，谁也没听到他为自己的处境抱怨叫屈。他和刘英念叨最多的是：“我这么多年没有为党工作了。”

刘英只能安慰他：“又不是你不干，是他们不让你干嘛。”

但张闻天仍不能释然于心，这是他此生最大的遗憾了。

7月1日这一天早晨，张闻天默默地打开收音机，听完广播，喝了几口

米汤，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静静地躺着。下午，他让黄关祥给他念《参考消息》，当时，他的眼病已很严重，只能听广播，不能看东西，有时也让别人给他念报纸。黄师傅念到4点多钟，张闻天轻声说：“你去做饭吧。”谁知饭没做熟，5点多钟，张闻天心脏病猝发，与世长辞。悲痛欲绝的刘英失声痛哭，昏厥过去……

因为当时中央指示“就地火化，继续保密”，刘英，张闻天生死相依的妻子，在丈夫灵前安放的花圈上，只能写着“献给老张同志”。悲哀和愤懑充塞了她的胸膛，她欲呼无声，欲哭无泪，只能把她永世不渝的爱，用心灵的话语，默默奉献在丈夫的灵前。

7月13日，南京《新华日报》第三版右下角登出了张闻天逝世的消息，全文仅78个字，首都报纸则一律保持缄默。一代伟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逝了。

对张闻天的爱鼓励着刘英顽强地活下去，她相信天空不会永远阴霾密布，总会有云开月朗的一天。她坚信，闻天对党的卓越贡献、他深刻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不会永远被埋没下去，历史终将还这一切以本来面目。

其实，就是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在她和张闻天身处逆境的时刻，刘英仍然能够感受到许多有正义感的战友和同志对他们的关怀和惦念。

1974年刘英回北京的时候，见到了胡乔木。胡乔木悄悄地问她：“洛甫同志怎么样啊？”刘英说：“他病很重，没有办法医治。请示也没有用，不批。”问起胡乔木的身体，胡乔木说：“我现在神经衰弱得很厉害，简直不能睡觉。”

1976的9月，刘英获准到北京瞻仰毛主席遗容。王震见到她，说：“闻天同志是我党的理论家，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学者。他写的东西有价值，你千万不能烧掉啊，一定要保管好。”

刘英说：“不烧掉危险哪。”

王震说：“如果不方便，把它放在我那里。我现在是毛主席的通讯员，副总理，没人敢来搜查我的。”

于是，刘英就把张闻天的一部分文稿交给王震。后来，胡乔木当了社科院院长，邓力群当了副院长，王震又把文稿转给了他们。王震对刘英说：“我现在把那些文稿交给他们了，叫他们给你出版。”



庐山会议后的张闻天

1977年8月，刘英搬回北京。得知当时胡耀邦担任组织部长，刘英就给这位曾在少共中央局共过事的老同事写了一封信：耀邦同志：你现在担任组织部长了，现在我们干部有了家了，我们已经多年没有家了，我现在非常高兴。不过组织部你要注意清查（刘英指整过他们的造反派），组织部的干部是非常重要的，你要选一些正直的人到组织部来工作，因为要大量做平反工作。接下来刘英郑重地推荐了几个人。让刘英没想到的是，胡耀邦看了她的信，从信封上知道了地址，竟然亲自来看了她。

那是1978年1月23日，一个刘英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她正在自己二楼的家中，见胡耀邦的秘书跑到楼上来，说：

“胡部长来了。”

刘英一时没反应过来：“什么胡部长来了？”

话音未落，就看见了那个熟悉的身影站在门口，穿着黑大衣，还是那永远充满朝气和活力的面容，大声对她说：“大姐，我看你来了！”

刘英的内心一阵激动，她尽量按捺住自己的情绪，笑着迎上去，说：“你这个部长怎么跑来了？以前见都见不到你。”

胡耀邦爽直地说：“我回来第一个看大姐！你有什么问题提出来，我给你解决！”

刘英说：“那好哇。我的问题就是想把闻天的骨灰迁到北京八宝山安放。现在放在无锡的一个破房子里，锁在一个破箱子里，很潮湿。我想应该放在八宝山，纪念一下。”出于谨慎的考虑，刘英没有提开追悼会的事。

胡耀邦点点头：“那没问题，你写个信。”他问刘英还有什么问题，刘英说：“没有了。”沉思了片刻，刘英又说：“我现在岁数大了，今年70多了，不能做什么工作了，我就想把闻天的东西整理一下。”

胡耀邦说：“那好。你就不要做什么工作了，你就是休息，健康最重

要。”

刘英说：“闻天写的文章我想争取出版。”

胡耀邦说：“那以后都可以的。”

见胡耀邦这样爽快，刘英心里非常感动。但她明白当时的形势，胡耀邦只是组织部长，没有更大的权力，所以，她没有提更多的要求。

望着眼前身为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刘英不禁想起了早年他们在红都瑞金同生死、共患难的斗争岁月。那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期，国民党的一颗炸弹落到了红军驻地附近。由于炸弹没有爆炸，红军兵工厂想把弹头取下来加以研究。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李德作了个硬性规定：任何人不准靠近炸弹，违者一律枪毙。

耐不住好奇心的驱使，刘英、胡耀邦和肖华三个年轻人不顾李德的禁令，悄悄地来到炸弹落下的地方，想亲眼目睹一下这个有神奇威力的铁家伙。哪知被看守的卫兵发现了。李德的命令还能违抗？不容分说，枪毙！三个人做梦也想不到会是这么个结果。

正当他们垂头丧气地被押着走向“刑场”的时候，在迎面的半山坡上碰见了博古。他问刘英：“这是到哪里去呀？”

刘英没精打采地说：“犯了纪律，要被枪毙了。”

博古知道了原委后，笑着说：“算了算了，还是小孩子嘛，枪毙什么呀。”

见总书记替刘英他们求情，负责执行枪决的人也就大事化无了。

不过，刘英他们倒是真经受了一次“死”的考验，他和胡耀邦、肖华从此真成了“生死与共”的朋友。

回想起当年的情景，刘英不禁感慨万千，她感到心中涌动着说不完的言语，但她尽力克制着，她相信，党内的正义力量一定会战胜邪恶，人民一定会还闻天的历史以清白，而她，也会有直抒胸臆的那一天。

按照胡耀邦的提醒，刘英给组织部写了请求迁回张闻天骨灰的信。组织部老干总局还派人去无锡查了，情况属实。但是，有人却从中作梗，在胡耀邦给他的信上批道：“不必迁动了。”老干部局的同志把这封信拿给刘英看，并对她说，耀邦同志的意见，先等一下，马上就要召开三中全会了。刘英并没有为这次挫折而失去信心，耀邦同志的话让她看到了希望，她相信，党的正义力量终将战胜邪恶。

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刘英写信给陈云、胡耀邦、王震，要求把张闻天的骨灰迁移回来，给他作结论，他写的文章要出版。王震、陈云都批示：完全应该，转各主席传阅。

在组织部长胡耀邦的亲自安排下，张闻天的骨灰终于运回北京。刘英在组织部一位老同志的陪同下去无锡捧回了丈夫的骨灰，邓力群亲自赶往车站迎接。张闻天，这位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奉献了一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终于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耀邦派人通知刘英：中央决定为张闻天开追悼会。听到这个消息，刘英真是喜出望外。这是她万万没有想到的事。陈云当时在杭州，胡耀邦给他打电话：“追悼会你参加不参加？”

陈云说：“我一定参加，无论如何要等我回来以后再開。”

胡耀邦问：“你主持还是致悼词？”

答曰：“都可以。”

胡耀邦征求刘英意见，问等不等陈云。刘英说：“等。迟一点有什么关系呀，已经拖了这么久了。”

刘英建议：追悼会邓小平主持，陈云致悼词。陈云说：“还是邓小平致悼词吧，这样规格高一些。”邓小平也表示同意。写悼词的是胡乔木和邓力群，关键地方胡乔木亲自把关。

1979年8月25日，张闻天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陈云主持，邓小平致悼词，充分肯定张闻天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历史终于作出了公正的结论。

那天，几乎所有的中央领导都到场了。邓小平操着他浓重的四川口音，感慨地对刘英说：“好多年不见喽！”陈云亲切地说：“你头发还是那么黑，没有老啊！”薄一波更是对刘英深表感谢，说：“要不是闻天我就成了叛徒了。”安子文也打电话感谢刘英。听到中央对张闻天的高度评价，看到同志们对张闻天的深切怀念和敬佩之情，回想起张闻天在最后的日子里时常萦绕于心的问题“不知道我还能不能看到组织作的结论”，刘英的心中百感交集：闻天，你地下有知，也该瞑目了。

根据张闻天的遗嘱，刘英为张闻天一次上交党费40000元。1981年6月29日，刘英向少年儿童福利基金会捐献储蓄40169.6元。两位老革命家对党和人民做了最后的奉献。

追悼会后，胡耀邦批准成立《张闻天选集》编辑组，编辑出版张闻天的遗著。这件事上曾彦修出了不少力。他当时是出版社社长，身体好，精力充足。他主张张闻天的文章先在报纸上发表，出小册子，造成一定影响。胡华也起了很大作用，他找到刘英说：要为闻天同志写传记。刘英说：“没有人哪。”胡华说：“我负责。”他找来了施松寒、张培森两位教授。真正组织文集的是邓力群，在胡乔木的支持下，邓力群为文集的编辑和出版倾注了大量心血：

1985年8月，《张闻天选集》出版；

1990年7月，《张闻天东北文选》出版；

1990年8月，《张闻天文集》（第一卷）出版；

1990年9月，《张闻天庐山会议发言》出版；

1993年5月，《张闻天文集》（第二卷）出版；

1994年6月，《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出版；

1994年12月，《张闻天文集》（第三卷）出版；

1995年2月，《张闻天社会主义论稿》出版；

1995年7月，《张闻天论青年修养与待人接物》出版；

1995年7月，《张闻天文集》（第四卷）出版；

1995年8月，《张闻天建议开放市场的报告——专题资料集》出版；

1997年9月，《张闻天在1935—1938年》年谱出版；

1997年8月，刘英回忆录《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出版，时年92岁的刘英，在这本书中，回顾了她的革命经历，并着重回忆了她和张闻天40多年相濡以沫、命运与共的历程。该书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

在帮助整理出版张闻天文稿过程中，在回忆她和张闻天不平坦的生活经历的过程中，刘英仿佛沿着丈夫生前的路重新走了一遍，重温了他伟大的人格和深刻的思想。看着丈夫的文稿变成了铅字，成了许许多多人传诵的精神财富，刘英感到欣慰：可以告慰他的英灵了。

张闻天和刘英，一生奉献无所求，戎马倥偬，呕心沥血，忧国忧民，无怨无悔。在他们同甘共苦的生命中，他们把一切都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党和人民也将永远记住他们。

伴君千里节杖行

——红色大使黄镇将军和他的夫人朱霖

黄 镇

(1909—1989)

岁月如流，转眼黄镇大使已经去世经年了。然而他在共和国外交史上所留下的足迹，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清晰地凸现在人们面前。

看来，世界铭记住他，自有铭记的道理。他所从事的非凡外交活动，是新中国外交舞台乃至世界外交舞台都绝少上演的剧目。在这个舞台上，他不但展示了自己的外交才能，也体现了自己的人格魅力。他的令行禁止的神态，还有那威严的洪亮声音，以及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威风，常常令后来的谈判者、敌对者胆寒。是的，他们是从黄土地走来的一代“土八路外交家”，而恰恰正是这批拥有将军资历的军人们，在新中国那特定的时期，开辟了红色的外交之路。

白玉兮为镇

80年代的最后一个冬天，北京的空气异常凝重。老外交部街东头一条冷清的胡同里，人比往常忽然多了起来，小轿车也多了起来。他们的目的都是一个，到那幢灰色老楼里，去悼念一位逝者。

沉痛主宰着这里的世界。

人很多，却无人交谈，甚至不愿彼此的目光相碰，以免碰落悠悠的哀思。死者生前居住的这座老楼，年久失修，已显出斑斑老态，如今过厅摆满了从钓鱼台运来的松柏、菊花和各地送来的花圈，更显得苍凉肃穆。遗像前，有人在弯腰致哀，有人在默默同遗属握手，时常响起哭泣、手杖倒地和叹息的声音。旧俗的黄幡旌旗、金钱冥纸、僧道鼓乐早已不复存在，可安徽桐城老家的乡亲们还是捧来了各色六尺锦缎，要把死者郑重地覆盖起来。

陆续前来的两三千人，大多同他很熟，曾与他并肩战斗过，或在他手下工作过；或受过他的接济，或挨过他的剌，听他朗朗大笑或大发雷霆……另一些人，虽没有直接同他打过交道，但从共和国的脚步声里，感觉到他的存在。无论是战争史、外交史或者文化史，人们都要提到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是一种象征：黄镇——白玉兮为镇。

来此悼念最多的人是外交官。因为他曾在外交战线奋斗了27个春秋。他曾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概、胆识和才智，肩负重任，不避风险，跑遍全球，结识了许多政界要人和各种各样的外交官。因此，他的去世，也惊动了世界。

仅在美国，在大洋彼岸，前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客厅凝视着与黄镇的几度合影，悲戚地致函黄镇夫人朱霖：

亲爱的朱霖女士：

今天早晨，尼克松夫人和我从《纽约时报》读到黄镇逝世的消息时，感到深深的悲痛。在刚刚过去的上个周末，我在宾夕法尼亚访问朱莉和戴维时，我们一致认为黄镇是我们在中国最老和最好的朋友。

在我几次访问中国时，他曾款待过我。他也曾做过我们在圣克

里门特和此间新泽西州塞德莱河上家里的客人。在我10月份访问北京时，我曾特别愉快地看到了他。他看来非常健康，我记得我对他说过，他的握手仍然像我一直记得的那样坚定、有力。

尼克松夫人、朱莉、戴维和我一起向你和你的家人表示我们最深厚的同情。

另一位美国前总统布什两度致电朱霖：

值此黄镇不幸逝世之际，我谨向你表示最诚挚的哀悼。黄镇是我的老朋友。我在北京担任美国联络处主任时，他也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华盛顿联络处的第一任主任。

在我们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之前的艰难时期，黄大使有幸参与了我国两国之间扩大了解、相互沟通的重要进程。黄镇对这一持续至今的重要进程作出了巨大贡献。

对失去黄镇这样一位努力促进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具有献身精神的政治家，请允许我向你和其他亲属表示最深切的慰问……

那位神秘的基辛格博士也打来了唁电；黑格将军则把黄镇的书画集摆在家庭图书室最显要的位置，按照西方的样式祈祷；前驻华大使恒安石把他珍藏的黄镇赠言：“山河异域，风雨同事”抄寄北京，说“对联所表达的情感，也同样适用于他……”

在别的国度，悼念活动也在进行。素以浪漫著称的法国人，在黄镇驻法期间，曾惊呼：“他的微笑征服了巴黎！”如今把他看作是“史诗般的伟大英雄”。巴黎市长、前法国总理希拉克在唁函中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法大使，黄镇先生在中法两国关系史中的九年留下了他自己的印记。他以其敏锐的思想、卓越的外交才干和很高的文化素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国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作出了令人钦佩的贡献。中国的所有法国朋友将永远缅怀他。”

匈牙利是黄镇外交生涯中的第一站。这个发生了沧桑巨变的国度，也没有忘记她的老朋友。匈牙利外交部在唁电中说：“他为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做了许多工作，是我们崇敬的政治家。我们深切地怀念他

.....”

他曾担任过七年大使的印度尼西亚，有许多华侨致电哀悼。一些侨领子女带着父辈的重托，经香港入境，风尘仆仆来到黄镇的遗像前；有的华侨还不知黄镇已离世，还像往常一样来信寻求他的帮助……

在中国台湾，《世界日报》也在黄镇逝世的第二天——12月11日，以“外交界红人，艺文界奇才”登出特稿。在介绍过简历后，称“黄镇为人稳健，长于外交及宣传活动，并有艺术天才。为中共外交界的一位重要人物，人称与耿飚、黄华为中共外交界的三个不倒翁”。



1973年，毛泽东与黄镇亲切交谈

说“不倒”，并不完全。他“倒过”，“文革”中他与耿飚曾被打成“耿、黄反党集团”，但毛泽东主席很快又“扶正”了他。毛泽东赏识他的才能，喜欢看他写来的材料，曾有意让他去当一当省委书记，以便担当全局性的工作；可似乎外交更需要他，于是由毛泽东点将，他又被派往具有战略意义的美利坚。

周恩来是他的另一精神支柱。当有人向中央诬告他时，周恩来去向毛泽东作解释；连

黄镇到达机场，周恩来也要叮嘱他厕所地滑，千万不要像黄华那样摔倒了。

素来爱才的陈毅，却从不本位。但是在黄镇要调离外交部副部长职位时，却破例陪着黄镇试图去说动周总理……

当人们走出灵堂，有时间思索的时候，不禁要问：新中国已经有过数百位大使，为何黄镇在人们的脑海里，乃至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占据了这样独特而重要的位置？

岁月如流，转眼黄镇大使已经去世八年了。然而他在共和国外交史上所留下的足迹，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清晰地凸现在人们面前。

看来，世界铭记住他，自有铭记的道理。他所从事的非凡外交活动，是

新中国外交舞台乃至世界外交舞台都绝少上演的剧目。在这个舞台上，他不但展示了自己的外交才能，也体现了自己的人格魅力。

从众人肩膀上望过去，可以看见他的那张遗像。那是一张饱经战火风霜、精力充沛、富于钢铁意志的脸。他紧抿着嘴，使得下巴撅起，略为上挑的目光扫视着周围的一切。他的一生表明，他完全有权傲视一切！他的令行禁止的神态，还有那威严的洪亮声音，以及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威风，常常令后来的谈判者、敌对者胆寒。是的，他们是从黄土地走来的一代“土八路外交家”，而恰恰正是这批拥有将军资历的军人们，在新中国那特定的时期，开辟了红色的外交之路。而黄镇大使走了，留给人们的不仅是有关他的传奇和缅怀，还有对当代的思索和昭示。



黄镇大使在联合国任职期间，曾于1973年

毛泽东周恩来派出的将军大使

奠基的礼炮声

刚刚解放的北平。蟾宫影院里坐着几位特邀观众。他们是来观看一部内部观摩片的，片名叫《郭子祺事件》。作为当年停战谈判新乡执行小组的中共方面首席代表、事件的当事人黄镇，自然在邀请之列。他进北京以后，在军委总政治部担任第一研究室主任，目前正在筹组军委总干部部。他和爱人朱霖都被银幕上的激烈场面吸引住了：

在一条纵贯南北的马路上，奔流着一股人潮，有的手里挥着小旗，有的在散发传单，忽然出现了一声声惊天动地的口号：“共产党枪杀郭子祺罪责难逃！”“以血还血！处死黄镇！……”

灵车过来了。一队队人披麻戴孝，端着祭品，抱着水酒纸香，呼天抢地……新乡谈判小组驻地成了人的海洋，连屋顶上，树杈上，都站着人。有人开始朝院子里扔石头，站岗的美国兵正横着枪，将拥过来的人往后推，可是人群还是朝前挤，直挤得铁门吱吱作响。“把凶手交出来！”“把黄镇交出来！”的口号声不绝于耳……

影片放完了，可观众还是坐着，迟迟不动。他们还没有从影片的紧张气氛中摆脱出来。郭子祺事件其实是一次误伤：郭子祺是一位有正义感、与共方关系不错的国民党军少校译员，乘车出外调查时，因烟尘阻隔了共方哨兵的视线，而被开枪误中致死。国民党谈判代表抓住这件事，大作文章，欲制强硬的共方代表黄镇于死地。

“唉哟，闹腾得这么厉害！”

朱霖擦了擦湿润的眼窝，朝坐在身旁的黄镇说道。尽管她明知事件的结局并未危及黄镇的性命，可是刚才银幕上的一切，仍使她的心吊到了嗓子眼。“当时我在太行一点消息也不知道。”

“不知道也好。”黄镇起身，和朱霖一起随着观众往外走。“这虽然是国民党歪曲事实、蛊惑民众的影片，但事实的严重性确也如此。”

“没想到和谈和谈，差点谈掉老命。”

“可能以后我还得干这个差事。”